

宗教在当前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的影响

徐以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关键词〕 美国宗教、美国外交、美国大选

〔摘要〕 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9·11”事件以来，宗教在美国对外关系上已呈现立法化、机构化、国际化、草根化、联合化、媒体化、安全化等趋势，在海外倡导所谓宗教自由、或推行所谓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已成为自越南战争后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外政策上的“两党一致”破局以来新的外交政策“意见一致”。

〔中图分类号〕 D928.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2-8832(2009)2期 0033—06

〔完稿日期〕 2009年1月28日

近30年以来，由于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的复兴和宗教右翼的“政治觉醒”，宗教在美国内政外交中的作用日益突显。宗教对美国政治的这种显性影响的标志性事件，在外交政策上是“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的通过；在国内政治上则是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全面的人权立法之一，该法案的通过和实施均较充分地体现了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程度。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为基督教福音派和宗教右翼的政治动员提供了舞台，“价值观选民”和“400万白人福音派选民重回投票站”，被认为是共和党获胜的关键因素。

然而，“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通过至今已有10年，不仅国际上对该法案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美国国内以及不少法案的当事人对法案实施的得失、尤其是对该法案是否促进美国国家利益，也有不少检讨和争论。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党一举重获总统职位以及对国会参、众两院的

控制权，所谓宗教差距，即经常上教堂的选民更倾向于投共和党的票以及共和党得到更多宗教选民的支持大大缩小，基督教福音派和宗教右翼的政治能量也受到质疑。^[1]

一、宗教在当前美国对外关系中的若干趋势

尽管对海外宗教问题的关注一直是美国政府和大众的偏好，但美国传统外交并不特别强调宗教。除个例外，上世纪以来美国历届政府所强调的是支持宗教自由的原则，而不是具体、直接和单边的干预行动。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当时尤其是冷战时期以地缘政治为核心的外交考量所致；同时，宗教团体议程过于广泛，缺乏目标、共识、专业知识和游说力量，在政策问题上往往持先知式不妥协的道德立场，也是重要原因。^[2]

然而冷战结束以来全球的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

和伊斯兰教)复兴、美国国内宗教右翼势力的崛起并与政治右翼合流、“9·11”事件后国际关系中宗教因素的凸显,以及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战略的非地缘政治化,均增加了宗教在美国国际战略考量中的地位,在全球推进所谓宗教自由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宗教在美国对外关系问题上呈现出以下或隐或显的七个趋势。

立法化(或国会化)趋势:主要指“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及其他主要由宗教团体推动的立法倡议,如“2002年苏丹和平法”、“贩运受害者保护法”、“2003年朝鲜自由法”、“2004年朝鲜人权法”等,其中“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建立了宗教因素直接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全新框架。从20世纪初以来的美国外交史来看,宗教因素的作用最突出地体现在1911年美国国会因犹太人问题废除俄美商约、1973年美国国会针对苏联犹太人问题通过的“杰克逊—瓦尼克法”以及国会通过上述“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等三大事件上,在此三大事件中国会在代表宗教利益影响美国外交政策方面都起了主导作用。

机构化趋势:指“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规定设立的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跨党派半官方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国际宗教自由的总统特别助理,以及涉及所谓宗教自由问题的美国政府和国会机构,如国会与行政部门对华委员会等;建立了在全球范围报告宗教自由问题和认定所谓严重违反宗教自由的“特别关注国”以及有选择制裁等机制。对所谓宗教自由的关注已开始渗入美国传统外交建制的文化。

国际化趋势:指以美国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人权国际制度或国际“人权联合体”的形成。宗教人权国际制度是由关于宗教人权的各种国际和地区性的公约/条约、各种旨在促进所谓宗教人权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各国(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国际宗教和人权政策等组成的庞大国际机制和网络。目前美国在所谓宗教自由问题上对中国便采取了结合单边、双边和多边施压手段的“多管齐下”的态势。

草根化趋势:指以争取所谓宗教自由为宗旨的

新人权运动的广泛群众基础。与主要倡导所谓政治权利的老人权运动或传统人权建制不同,新人权运动是草根运动,背后是所谓宗教美国(其中基督教福音派便号称有5000至8000万信徒),政治动员走国会路线;而老人权运动则主要是精英运动,政治游说基本上走传统外交路线。“新人权运动”具有极强的基层动员能力,对此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普特南评价说,美国“宗教保守派创建了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最大和组织最好的草根社会运动”。^[3]

联合或联盟化趋势:指美国宗教组织在宗教自由议题上结成有不同团体参与的各种全国性或跨国性的盘根错节的所谓倡议者网络,共享人员、资源、机构和信息,以造成更大声势对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施加压力。如近年来致力于反对所谓苏丹政府宗教迫害的“达尔富尔运动”的核心组织之一“拯救达尔富尔联盟”就曾拥有180多个成员组织,其中包括美国最大的一些宗教组织,这些成员组织遍及美国的社区教会网络,为该运动提供了民间政治动员的巨大资源,而其广泛的跨国联系又为该运动的国际活动提供了渠道。目前美国关于所谓国际宗教自由问题的立法,主要就是由这些宗教联合组织或立法联盟所推动的。如倡议“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的宗教右翼团体,就利用该议题在美国高度的敏感性广泛结盟,“将自由派犹太教团体与保守派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与西藏佛教徒、圣公会教徒与救世军结为一体”,^[4]成功地将其外交政策议题“主流化”,从而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实质性影响。

媒体化趋势:指宗教人权运动不走传统外交路线,除动员基层外,其惯用的运作方式就是诉诸媒体,尤其是诉诸进入“门槛”较低的网络媒体,这使其在获取各种信息、影响政治议程和信众政治选择方面具有更多的途径和更强的能力,而所谓宗教自由议题本身也具有极大的媒体效应。这些均使所谓宗教自由问题溢出传统外交渠道,缩小了传统外交建制的运作空间,从而使宗教问题在美国对外关系中更具对抗性。

安全化趋势:主要指美国外交和安全权力建制

已开始从国家安全和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宗教问题,不仅把宗教自由看成是人权问题,而且视之为“国家安全的界定因素”,或是某种“硬性”的地缘政治和“国土安全”问题,鼓吹“宗教自由即促进国家安全”的“宗教自由和平论”,把在全球推进所谓宗教自由与“反恐怖主义”和“反宗教极端主义”结合起来,实际上已将宗教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等量齐观。如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第一任主任托马斯·F. 法尔在2008年3/4月的《外交》双月刊上就再次呼吁美国外交应使“保护和扩展宗教自由成为其核心因素之一”,并宣称“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心议题是伊斯兰恐怖主义”。^[5]目前在美国,宗教自由问题已与人权问题脱钩而成为独立的外交政策议题,而倡导所谓宗教自由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圈子的标准话语。

目前美国朝野对宗教问题在其对外关系和国际战略中的地位看法渐趋一致,关注国际宗教自由似已成为自越战以来在对外政策上的“两党一致”破局以来新的外交政策“意见一致”;而“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昔日“传教士外交”以及当今“人权外交”的最新版本。“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解释。^[6]就美国而言,“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可被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社会政策化(即关注公共或社会政策议题)与反映宗教团体和信徒大规模介入外交领域特征的所谓国民外交的某种结合。而宗教在美国对外关系上的上述趋势,便具有“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的鲜明特征。

二、宗教在2008年美国大选中的作用

2004年大选共和党大获全胜,作为支持共和党的最强有力选举集团之一的基督教福音派似乎已经见到了其政治抱负上的“应许之地”,保守福音派领袖如“爱家”的詹姆斯·C. 多布森等在共和党内得到“总统制造者”的礼遇,有政治分析家甚至认为基督教福音派与共和党的联盟可使共和党在美国政治中长期占据支配地位。但在2006年美国

中期选举中,布什首席政治顾问卡尔·罗夫在2004年大选中利用宗教选民呼风唤雨的政治魔力不再灵验。在2008年大选中,民主党不仅在几乎所有具有不同信仰程度的选民群体中,^[7]而且在几乎所有宗教团体中的得票率均较2004年大选有所提高,使两党选战中的“宗教差距”明显缩小(见下表)。

2000年至2008年大选民主、共和两党得票率(根据宗教归属)

	2000年 (%)	2004年 (%)	2008年 (%)	民主党 得票率: 2004 - 2008年
	戈尔 布什	克里 布什	奥巴马 麦凯恩	
得票率	48	48	53	+5
	48	51	46	
新教徒	42	40	45	+5
	56	59	54	
白人新教徒	35	32	34	+2
	63	67	65	
福音/重生派	/	21	26	+5
	/	79	73	
非福音派	/	44	44	0
	/	56	55	
天主教徒	50	47	54	+7
	47	52	45	
白人天主教徒	45	43	47	+4
	52	56	52	
犹太教徒	79	74	78	+4
	19	25	21	
其他信仰	62	74	73	-1
	28	23	22	
无教会归属	61	67	75	+8
	30	31	23	

资料来源:2000, 2004, 2008 National Exit Polls, <http://pewforum.org/does>(Nov. 12, 2008).

两次选举的巨大落差使得人们不禁要问,基督教福音派的政治能量是否已开始下降?美国的宗教保守派是否已经过气,其政治势力由盛转衰的拐点是否已经出现?这些问题可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考虑:一是2004年以来美国政局的变动,宗教已不再成为政治选战的重大议题;二是基督教福音派内部开始出现不同声音甚至左倾趋势,其与共和党的长期政治联盟出现松动和裂痕;三是民主党开始“拥抱宗教”,“讲宗教”不再是共和党的专利。

首先,宗教在2004年美国大选中作用突出,因此该选举年有“价值观选民年”之称。但由于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的泥沼,2007年夏又爆发次贷危机并由此引发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

济危机,传统经济和社会问题超过伊拉克战争而成为总统选举年的头号问题。在2004年大选中宗教保守派的三大议题——反对同性婚姻、堕胎和干细胞研究——对其政治动员已不再有效,2008年成为“经济年”或“金融风暴年”。就大选议题而言,大选前后各种民调表明,美国选民认为经济、能源与油价、医疗保健、反恐、伊拉克战争等依次为2008年大选最重要的议题,其中经济被所有宗教团体中列为头号议题;与此同时,美国一般选民把堕胎和同性婚姻列为2008年大选最不重要的问题,连白人福音派也未把此两个问题列为他们最关注的五大议题之一。经济社会问题的彰显以及伊拉克战争的困局大大压缩了共和党和宗教保守派运作所谓道德问题的政治空间。

第二,宗教保守派尤其是基督教福音派向左转以及福音派——共和党联盟的松动既有短期,也有中、长期的原因。就短期原因而言,共和党的道德和贪腐丑闻、布什政府在推进福音派议程上言行不一,福音派感到被利用和受欺骗,以致使长期以来被视为共和党基本盘的基督教福音派在2006年中期选举和2008年大选投票日“守斋”。如卡尔·罗夫就认为,有超过400万每周去教堂不止一次并在2004年大选中投票的福音派人士在2008年未去投票站。^[6]伊拉克战争也是导致福音派不满的重大原因,美国基督教福音派重要杂志《今日基督教》甚至还提出基督教福音派是否应为他们迅速支持入侵伊拉克一事“忏悔”的问题。^[9]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经历了自卡特总统以来在政治上的第二次幻灭。

就中、长期原因而言,基督教福音派在20世纪70年代末“政治觉醒”,至今活跃于美国政治舞台已达30年之久。30年前把基督教福音派带入共和党并实现其政治右转的老一代福音派领袖不是已经作古,就是已逐步淡出历史舞台,基督教福音派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已全面展开。新一代的福音派领导人拒绝旧的政治标签,刻意与共和党保持距离,开始使“福音派世界”摆向温和或中间立场。基督教福音派领导层的内部分歧也反映了该派社会地位的变化。在过去的30年中,被认为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基督教福音派的教育、收入、社会地位和都市

化或市郊化程度有明显提高,社会意识增强,他们虽仍支持福音派传统议题,但保守福音派领袖年复一年、每周必弹的反“堕胎”、“反同性婚姻”等所谓文化战争老调已不再能引起他们最大的兴趣。他们开始关注所谓中产阶级议题,政治议程有所扩大,涉及反战、环境保护、移民、全球贫困等社会问题,出现“绿色环保基督教”等新福音主义思潮。事实上,全球变暖等问题已成为引起福音派领导层内部严重分裂的问题。2008年5月7日,80多位温和福音派宗教领袖在华盛顿签署的《福音派宣言》中,宣称基督徒应超越“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否则福音派信仰将失去独立性而沦为政党的工具。^[10]但一些基督教保守派领袖看不到或不能适应福音派社会基础的变化,仍将福音派与共和党捆绑在一起,结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脱离了福音派群众,尤其是失去更愿意成为独立选民并更倾向于支持奥巴马的福音派青年的支持,使福音派的内部分歧不仅以领导层内部、而且以领导层与基层信徒分歧以及新老福音派之间“代沟”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某种程度上保守福音派领袖重蹈多年前基督教自由派的覆辙,成为“渐失士兵的将军”。

第三,民主党“拥抱宗教”,争取福音派选票,也是福音派与共和党的政治联盟出现松动的一个重要原因。2004年大选民主党在宗教问题上再度严重失分,克里身为天主教徒却不能获得多数天主教选民的支持。民主党领导层痛定思痛,达成共识不再把“道德大旗”拱手让与共和党,改变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放弃白人教会的做法,从基层党组织到全国机构开展了该党有史以来最大的宗教拉票行动。民主党“拥抱宗教”被媒体和政治评论家渲染为“民主党宗教大觉醒”和“新道德多数派”的崛起,宗教左翼/进步派的政治复兴是2008年大选在宗教领域的主要特点。

与此同时,民主党也在积极修复它与天主教会的关系。多年来民主党及其候选人均因堕胎问题疏远天主教徒,而本次大选前后民主党领袖谋求在移民、最低工资和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与天主教会结盟,而天主教会越来越直言不讳地反对伊拉克战争,

也加速了此种修复过程。2008年大选民主党在天主教徒中的支持率从4年前比共和党少5个百分点到反超7个百分点,再次表明天主教徒是美国政治中最大和最典型的摇摆选民团体。而把重点从动员基本盘转向争取摇摆和独立选民尤其是天主教选民,被证明是本次大选民主党成功的选战策略之一。

三、宗教对大选后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影响

美国国内外政局的变化,基督教福音派内部的分化以及民主党的“宗教觉醒”,使一度似牢不可破的共和党与保守福音派联盟之间出现裂痕,以致该党推不出可同时被经济保守派和社会保守派、福音派草根信众和上层领袖接受的像当年小布什那样的理想候选人。《纽约时代杂志》早在2007年发表署名文章,认为基督教福音派“没有合适的总统候选人,没有团结的领导层,并且看来甚至不再拥有共同的政治信念,”因此福音派在美国政治中已“日暮途穷”。^[11]

因美国正面临严重经济危机,2008年大选在宗教上是“小年”,宗教议题不可能像4年前一样成为引起社会分裂的楔子问题。不过目前尚未有充分证据表明福音派在政治上已经“过气”,2008年大选也不一定就是对保守福音派权力建制的“公信力测试”,选民不按所属宗派而按信仰程度进行投票的趋势在未来仍将继续,事实上民主党“拥抱宗教”恰好是基督教福音派力量的显示:正是基督教福音派持续30年的政治影响力把某种程度上的宗教测验加之于当今美国的总统选举。基督教福音派摆脱与共和党联盟的羁绊,反而使其获得更多政治上讨价还价的能力,为其与包括民主党在内的其他势力就各种福音派议题组建新的联盟创造了条件,并因此有可能对美国社会产生更加广泛深入的影响。

就两党宗教差距而言,尽管2008年民主党的宗教拉票行动取得成功,尤其在争取天主教选票方面,但宗教差距依然存在:首先,民主党在本次大选提高了在白人新教徒和基督教福音派中的得票率,但整个格局依然是“红肥蓝瘦”,共和党在这

两个选民团体中仍拥有巨大优势;其次,宗教议题在本次大选中的重要性降低,但仍出现在不少州的选票上。在本次大选中,加州、佛罗里达和亚里桑那三州通过公民投票禁止同性婚姻,使美国禁止同性婚姻的州达到29个,而禁止同性婚姻是近年来宗教保守派最重要的议题之一;第三,民主党的“宗教觉醒”或“宗教皈依”也有相当大的局限:一方面宗教保守派并不买账,^[12]而且民主党长期以来排斥宗教的“负面”形象根深蒂固,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另一方面2006年中期选举民主党翻盘和本次大选获胜,依靠的主要是宗教自由派和通常不上教堂的选民,这使党内权力建制中的不少人对本党讨好福音派选民的做法和新近的宗教关注持怀疑态度。

与两党宗教差距有关的是所谓文化战争问题。鉴于本次大选社会道德问题重要性下降,有论者认为美国社会宗教左右两翼之间的“文化战争”已经偃旗息鼓。对此可作以下分析:首先,美国宗教格局不是简单的左右双峰对峙,红蓝两大阵营的对立并没有文化战争论者所形容的那么严重,故被称为“文化口水战”。^[13]虽然“文化战争”可能对美国宗教左右两翼各10%至15%的选民而言确实存在,但绝大多数宗教选民是中间派,无论在神学还是在政治上均呈现极强的多元性,有学者就将美国宗教选民按神学观点和政治倾向的差异划分为12个不同的部落;^[14]其次,对文化战争也有界定问题,如把文化战争界定为文化/经济大众主义与文化/经济精英主义之争,或容他性的政治文化与排他性的政治文化之争,那么文化战争论对当前美国的政治文化依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不过在这里大众主义和精英主义也有交叉:被认为代表经济精英主义的共和党标榜代表文化大众主义,而标榜经济大众主义的民主党则被认为代表文化精英主义;第三,奥巴马作为黑人竞选及当选总统,本身就可被视为某种文化战争问题,反映了美国社会文化的重大变化。事实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堕胎、同性婚姻等宗教价值观问题才取代“肯定性行动”等种族问题成为所谓文化战争的首要问题。总之,2008年大选美国在文化和宗教领域尽管并非硝烟弥漫,但也远

不是风平浪静。

对共和党而言，自里根政府以来共和党的政治基础或所谓里根联盟被比喻为三条腿——即支持强大国防、低税收、保守宗教和社会价值观的三股势力——的板凳。2008年大选表明此三条凳腿开始摇晃，党内此三股力量并未形成合力。在本次大选失利后共和党要想翻盘，在政治上就要做加法，除重回其政治基础外，还需争取“关键投票团体”如青年选民和拉美裔美国人等的支持。然而本次大选政治上最大的输家之一是美国南部，民主党无需像过去那样实施迁就该地区保守势力的“南部战略”照样能赢得大选。过去数十年来共和党的“南部化”以及南部在美国政治上的边缘化，缩小了同样以南部为重心的共和党和基督教福音派的政治活动空间，使共和党与基督教福音派一样，也面临着在不过分倚重对方的情况下重组和扩大其政治联盟的难题。

目前，宗教势力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影响尽管受到各种传统因素的制约，如美国外交建制的现实主义传统、亲企业的共和党传统以及宗教团体内部纷争的传统等，但它已成为平衡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公司利益和战略考量的重要力量，并且使对所谓宗教自由的关注成为美国全球政治的一个核心目标。就对华政策而言，目前美国朝野已形成两个比较明显的共识或意见一致：一是推进所谓海外宗教自由，在目前美国宗教的基本面以及宗教影响美国外交的现行机制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会减少个人色彩但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民主党的“讲宗教”和在中期选举及本次大选的获胜，加强了目前国会已经形成的贸易保护主义与宗教人权联合体，加上奥巴马当选后府院并轨，这将使中国在宗教人权和经贸问题上受到来自美国政府的双重压力，其中经贸问题将更为突出，这一点与其内部有足够强大的企业利益来平衡其宗教利益的共和党政府会有所不同；二是基于美国国家利益和中国当前国际地位、把中美关系视为当前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的两党共识以及此种共识的日益机制化，尽管此种中美关系两党共识通常采取在野与在朝前后不一、前

倨后恭的方式。就上述两种共识而言，在一般情况下后者即中美关系两党共识对前者即所谓宗教自由两党共识形成牵制，使之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搅局而非决定性因素；但在特殊情况下，宗教团体通过诉诸被美国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并结成广泛的政治联盟，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中美关系的现状并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某些方面产生有效和实质性的影响。宗教问题在中美两国均具有高度敏感性。从1949年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两国关系缓和以来宗教问题就一直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15]就目前而言宗教问题仍是中美关系的“温度计”，对两国关系的走向具有指针性作用。

注 释：

[1] 可参徐以群：《宗教与当前美国政治》，载徐以群等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政府组织》（第5辑），时事出版社2008年，第512-520页。

[2] 徐以群：《宗教与美国外交政策》，载《和平与发展》（2008年第1期），第62-66页。

[3] 引自 Aien D. Hertzke, *Freeing God's Children: the Unlikely Alliance on Global Human Rights*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4), pp.30,34.

[4] Allen D. Hertzke, "The Faith Factor in Foreign Policy: Religious Constituents and Congressional Initiative on Human Rights," in *Extensions* (Spring 2001), p.16.

[5] Thomas F. Farr, "Diplomacy in an Age of Faith, Religious Freedom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8), pp.111,112. 另参 Thomas F. Farr, *World of Faith and Freedom: Why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Liberty Is Vital to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6] 可参徐以群：《宗教与当前美国外交》，载上引《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政府组织》，第494-495页。

[7] 根据选后民调，每周一次或多次参加宗教崇拜的选民中有43%支持奥巴马，比4年前支持克里的39%增加4个百分点；每月或每年数次参加宗教崇拜的选民中有57%支持奥巴马，比4年前支持克里的53%增加4个百分点；从不参加宗教崇拜的选民中有67%支持奥巴马，比4年前支持克里的62%增加5个百分点。资料来源：2000, 2004, 2008 National Exit Polls, <http://pewforum.org/does> (Nov. 12, 2008).

[8] Karl Rove, "A Way Out of the Wilderness," in *Newsweek* (Nov. 24, 2008), p.31.

[9] 引自 David D. Kirkpatrick, "The Evangelical Crackup," in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 28, 2007), p.43.

[10] *An Evangelical Manifesto: The Washington Declaration of Evangelical Identity and Public Commitment*, May 7, 2008, Washington D. C., <http://www.anevangelicalmanifesto.com>.

[11] 前引 *Newsweek* (Nov. 24, 2008)封面。

[12] 如詹姆斯·C.多布森就指责奥巴马“故意曲解”（下转第44页）

的默许和支持下,以色列最近对加沙地带发动了大规模武装进攻,杀死杀伤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人,其中多数是无辜平民。这激起了阿拉伯和伊斯兰民众对美国的新仇恨。其中不少人赶赴阿富汗参加塔利班抗击美军。这是塔利班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其四,美国的“反恐谋霸”政策有碍国际反恐合作。美国打阿战不只是为了消灭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也是为了扩大势力范围,将军事触角伸进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战略需要。美国不仅企图通过阿战取得有利于遏制它所谓的“潜在对手”的地缘战略优势,而且对反恐盟友巴基斯坦,也肆意越界进入其境内追击恐怖分子,粗暴侵犯其主权。美国这种以霸权目的和手段反恐的做法,很难取得阿周边有关国家的认同和有效配合,最终不利于其打击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反恐战争。

在客观上,美军对手塔利班尽管人数和装备与美军及其盟军相比处于绝对劣势,但是一个信仰坚定、斗志昂扬、士气高涨的武装集团,有一定的实力和较大的能量,很难对付。塔利班战士土生土长,熟悉当地地形,又以抵抗外敌相号召,得到相当多数阿富汗人的支持。他们利用这种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在全国开展“打了就跑”的游击战,神出鬼没,进退自如,能以少胜多。驻阿联军对此防不胜防,很难找到准确的打击目标,且其现代化武器在布满高山深谷的阿富汗难以发挥效用,要在场典型的不对称战争中大获全胜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塔利班不是孤军奋战,伊斯兰世界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激进势力怀着对美国的深仇大恨坚定地站在塔利班一边,不断对其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使塔利班能够坚持长期抗战。

上述表明,美国虽占据战场优势,但要消灭塔

利班却是难以完成的任务。同时,塔利班也更不可能实现赶走外敌、恢复政权的目标。阿富汗战争再打下去,不可能有赢家。阿富汗问题只有通过和平谈判和实现全国和解来解决。由于双方所提和谈条件完全相左,和平前景曙光未现。阿富汗战争还将拖延下去。

注 释:

- [1] Helmand at War, The Changing Nature of the Insurgency in Southern Afghanistan and Its Effects on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The Senlis Council Report, June 2006. P17.
- [2] 陈一鸣:《阿富汗袭击事件频频发生》,《人民日报》,2006年2月6日第3版。
- [3] Harvey Thompson, "Afghanistan under occupation: An assessment—Part 2", <http://www.wsws.org/articles/2007/feb2007/afgh-f15.shtml>.
- [4] 郑瑞祥:《阿富汗的和平与重建任重道远》,《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5期,第13页。
- [5] "Afghan death toll soars to 8,000 /ast year",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08/mar/11/afghanistan.unitednations>.
- [6] 同注释[3]。
- [7] "塔利班击毙外国部队‘粮草’",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12/09/content_10475441.htm.
- [8] "U.S. death toll in Afghanistan was 1 last month", http://www.latimes.com/news/nationworld/iraq/complete/la-fg-afghan2-2008dec02_0,7488508.story.
- [9] "报告称塔利班恐重新控制阿富汗 活跃于美使馆区",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12/10/content_10480401.htm.
- [10] 辛本健:《美国国防战略的调整》,《人民日报》,2008年8月5日第3版。
- [11] 徐步青、孟祥麟、李学江、章念生:《面对阿富汗:各有各的顾虑》,《人民日报》,2008年2月5日第3版。
- [12] James Cogan, "Afghanistan: Growing talk of a political deal with the Taliban", <http://www.wsws.org/articles/2008/oct2008/afgh-o15.shtml>.
- [13] "Gates says thousands more troops will be sent", http://www.latimes.com/news/nationworld/iraq/complete/la-fg-iraq-briefs12-2008dec12_0,7923092.story.
- [14] 王南:《战和两难的尴尬》,《人民日报》,2008年10月16日第3版。

(上接第38页)对《圣经》的传统解释以适合他自己的世界观及其混乱的神学”。引自 Lisa Miller and Richard Wolfe, "Finding His Faith," in Newsweek (July 21, 2008), p.19.

[13] Leo P. Ribuffo, "Afterword: Culture Shouting Matches and the Academic Study of American Religious History," in Bruce Kuklick and D. G. Hart, eds., *Religious Advocacy and American History* (Grand Rapids, Michigan: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97), p.221.

[14] 分别为宗教右翼、腹地文化斗士、温和福音派、新教主流派

核心、天主教可争取派、宗教左翼、信仰但不归属派、世俗派、拉美裔、犹太人、穆斯林及其他信仰、黑人新教徒等。见 John Green, Dan Gilgoff and Steven Waldman, "The Twelve Tribes of American Politics in the 2008 Election," <http://beliefnet.com/News/Politics> (Oct. 30, 2008).

[15] 可参 Dong Wang, "Portraying Chinese Christianity: The American Press and U.S.—China Relations since the 1920s," in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vol. 13 (2008), pp.81—119.

PRECIS

Brief Analysis of Climat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Climat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ilateral all-round strategic cooperation. Since this year, the cooperation has achieved great development, but there still exists restrictive factors. To expand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is in the important interests of China and ASEAN.

Religion's Impact on Current American Politics and Diplomacy

Since 1990s, especially since September 11, religion has presented a tendency of legalization, institutionaliz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civilianization, combination, medialization, securelization, etc i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To advocate "freedom of religion" or carry out "faith-based diplomacy" has become new "consensus" of the Republicans and the Democrats since consensus of the two parties in foreign policy ended after Vietnam War.

Origin of Somali Pirates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Recently, the piracy off Somalia's coast is very rampant and harmful. The United Nations passed many resolutions to call for international action against Somali pirates. Only in both temporary and permanent measures can the scourge be eliminated gradually.

Several Judgments of Current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In 2008, the financial crisis, energy crisis and food crisis hang over the world economy. In particular, the financial crisis to spread ou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around the world and from virtual economy to real economy interrupts the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 world economy.